



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丛书
Publications to Celeb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by Dr. Sun Yat-sen

孙中山研究从录

李吉奎◆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丛书
Publications to Celeb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by Dr. Sun Yat-sen

孙中山研究从录

李吉奎 ◆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研究丛录/李吉奎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306 - 05072 - 4

I. ①孙… II. ①李…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5886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邹岚萍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何 凡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8.75 印张 5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 90 周年校庆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李 萍 陈春声 黎孟枫

主 任：梁庆寅

成 员：李 萍 李宝健 陈汝筑 梁庆寅

黄天骥 邱 捷 程焕文 丘国新



总 序

李 萍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 90 周年。90 年来，中大人秉承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明传承与创新上砥砺前行，形成了中山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纪念和庆祝建校 90 年，学校以“学术与校友”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建立了学校的顾问董事会，举办了全球中大校友会会长论坛等等，出版“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 90 周年校庆丛书”就是这次校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套丛书包括《孙中山研究丛录》、《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修订版）》、《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增订本）》、《中山手创 巍巍上庠》、《声振神州：孙中山在中山大学及前身院校的演讲》、《辛亥革命与新中国》、《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中大童缘》、《岭南记忆》、《思华年——中山大学外语人的故事》、《康乐芳草：中山大学校园植物图谱》、《泽惠翰林 德铭千秋：1978—2014 年中山大学获赠建筑集萃》、《校园歌曲 30 年》、《中山大学外语学科 90 年（1924—2014）》共 14 部。这 14 部著作，有的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中山先生的思想、精神和伟大贡献作出了新的阐发，进一步深化了孙中山研究；有的打开尘封已久但依然鲜活的记忆，讲述了中大的人、中大的事、中大的草木、中大的建筑，呈现了一个个动人的中大故事；有的把笔触投向中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系，从多个视角阐述了中山大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形成、发展过程中的

地位和重要贡献。为完成这套丛书，各书的作者花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丛书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他们热爱中大、心系中大的赤诚之情。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在凝聚中大精神、传播中大文化方面起到推动作用。

撰写、出版有关中山大学的历史和当前发展的书籍，校庆自然是合适的契机，但是这项工作当然不止于校庆期间。我们希望“书写中大”成为中大师生、校友的常态，在书写中寄托爱校的情怀，寄望学校的发展，让中大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大文化薪火相传。

是为序。

2014年12月1日于康乐园

前言

自从1979年中山大学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后，约20年间，国内的孙中山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孙中山和他的时代”成为热门话题，逐渐形成一门“孙学”；这个“孙学”还被称为“显学”。然而，斗转星移，进入新世纪以来，这门“显学”走过了它的辉煌历程，逐渐式微，当下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已经极为有限了。有的学者担心，孙中山研究将后继乏人。这种忧虑确实使人思考它是否多余的问题。诚然，一门学问的研究，只有归于常态化以后，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才有可能正常地开展。

孙中山在其生前尤其是身后，曾获得许多殊荣，他头上有过许多光环，如国父、世界伟人、世纪伟人、民族英雄等。当然，贬损孙中山的政敌或学者也不乏其人。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被人普遍地、毫无争议地接受。但是，如果不是另有目的的话，看待一个历史人物，评判其是非功过，还是要看他的主要方面，比较他与同时代的各式人物，看他为国家民族做了些什么。研究孙中山，事同此理，观其30年革命生涯，波澜壮阔，是弹是赞，非可以一言尽，关键是将史事真相说清楚，实事求是，展示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孙中山。

平实而言，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中国近代化先驱之一。孙中山不是什么“完人”。作为一位革命党的领袖，在他存活的年代，党内外人士就曾对他有过各种各样的评论。时代产生了孙中山，孙中山也义无反顾地以天下为己任。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目标，但他的任务过于艰巨，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连他本人晚年也承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在1925年去世后，留下一笔厚重的政治遗产，即他的思想学说与充满变数的党和事业。

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革命事业的历史价值，正是后人所要研究的问题。由于史学研究论著不是宣传品，故很难说研究它能直接产生多少社会效用。然而，孙中山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建设理想，以及联俄外交政策，其影响所及，恐将历数百年而不替。从这个意义来说，孙中山研究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准此以观，孙中山研究之所以能形成“孙学”，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即有助于国家民族的统一、文明与进步。有价值的课题总会有人去研究的，所以，不必忧虑孙中山研究后续的兴衰。

1981年年初，我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调来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今研究所），成为孙中山研究的从业人员。30多年来，我先后参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及《孙中山志》的编辑、编纂工作（现在还在参与《孙中山全集补编》与《孙文全集》的编辑）；出版了《孙中山与日本》与普及读物《孙中山》（这本小册子迄今已印了两三万册）；写了百余篇论文，其中大部分已收入论文集《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与《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两书中。我还翻译了日本藤井昇三教授的《孙文研究——以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中心》一书及另外一些日本学者的论文。另外，参与编写《辛亥革命运动史》、《广州——辛亥革命策源地》等书，还参与主编《辛亥革命广东馆藏资料选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下编）。这些研究或资料编纂能够完成，均得益于我所在单位的学术环境及同仁的支持，春风夏雨，每一念及，辄生感激之情。

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中山大学出版社为庆祝学校九旬华诞，计划出版一批孙中山研究书籍，本人忝列其中，自感荣幸之至。在此，首先对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厚意表示由衷的谢悃。

这本《孙中山研究丛录》，便是根据中山大学出版社的意向编辑的。书中所收各篇，包括从已刊的《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二书中挑选出来的，以及尚未结集的已刊、未刊的论文。它实际上是著者研究孙中山的自选集。书中各篇，有少量并非专门讲孙中山而事涉孙氏者，亦予以收录，在此附带说明。

本书各篇，有些是二三十年前写作的，因受资料、见识等条件的限制，显得有点单薄和肤浅。现在虽然情况有了变化，但是欲重新去作补充和修饰，显然又为精力和时间所不许可，故只能按原样排出（个别篇有所订正）。前贤有所谓“悔其少作”者，可是我起步研究孙中山时已年逾不惑，中年附骥，勉强从事，学殖所限，只能坦白地说是“卑之无甚高论”而已。时空转换，观念更新，今兹汇新旧作品于一册，若能获读者之一瞥，已是感戴不尽了。

中山大学出版社编审邹岚萍女士、责任编辑李海东先生为本书的出版费心尽力，付出巨大劳动，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李吉奎

二〇一四年元月廿六日
于中山大学步云轩

目 录

香港商人与辛亥革命	1
张弼士巨款援孙说质疑	8
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与政局	16
1912—1913 年间孙中山的联日外交	40
护国战争与日本	51
欧战期间的孙中山	63
孙中山与外蒙问题	78
孙中山与“西藏问题”	90
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	107
1921—1925 年间的孙中山与旧交通系	119
1923—1924 年间孙、陈调和问题研究	138
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蒋关系研究	151
黄埔军校创办缘起	168
中国致公党为何弃孙选陈	185
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与联邦制理想	205
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	213
孙中山论明治维新	229
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	245
孙中山与基督教	256
传统观念的现代诠释	
——孙中山宣誓观研究	267
孙中山民德观刍议	282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说新议	295
孙中山与刘学询	311
孙中山与国内上层知识分子	
——以汪康年资料为中心	333
孙中山与横滨华侨冯氏昆仲	355

孙中山与刘成禺	366
孙中山与王宠惠	384
孙中山与杨崇伊父子	398
是非蜀洛待澄清 ——孙中山章士钊关系初探	404
孙中山与民元实业界	419
孙中山与“满铁”关系者	429
康梁师徒对孙中山逝世的反应	438
孙中山，一个被取、用的名字	448

香港商人与辛亥革命

从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算起，迄1911年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过程中，香港一隅之地起着重大作用。它是广州重阳起义与惠州起义的军事出发点。同盟会成立后历次起义，亦大多以香港为基地，筹措经费，募集人员，购买械弹，乃至预为撤退之去路，莫不以此地为依托。香港兴中会、同盟会香港分会以及同盟会南方支部，先后是该地指挥机构，而《中国日报》则为革命党活动之中枢。或谓香港为革命党对内地活动之策源地，信然。

香港割让后的百余年间，内地与香港间仍自由通行，无须办护照或通行证一类的什物。这种状况，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由于来往自由，一些内地人士或华侨到港谋生，经营产业，或久或暂，统称港人。参与、支持革命活动的港人，除了知识界的若干精英，便是被冯自由称为“同志商人”^①的香港商人。在当时条件下，事实上也不易区别一般商人与买办商人的关系，故本文笼统称之为香港商人，概念亦较含糊。然此辈对中国民主革命之发足，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不纪。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得友人信，以国内事大有可为，乃返国，于1895年1—2月间返抵香港。他以自己同志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人为班底，结合原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等人成立香港兴中会，设机关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此名为黄咏商所取。港人陆续加入者，有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亭、朱贵、丘四等数十人。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众议决定在广州大举，即是年的重阳起义。推定孙中山在广州专任军务，发展组织，由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佐之。杨衢云驻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务事务，黄咏商、谢纘泰等辅之。广州重阳起义准备过程中的经费，缺乏详细记载。杨衢云在港筹措所得，见于记载者仅两笔。一为黄咏商捐款。咏商是黄胜之子。黄胜，香山人，世居澳门，是容闳同时

^①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的留美学生，回港后致力办印刷及经商，曾任香港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①“广州重阳之役，咏商鬻其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得资八千元。”^②另一位捐资者是愉园主人余育之。育之为日昌银号东主，富商，由杨衢云介绍入兴中会。育之独慨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衢云、黄咏商等至红毛坟场交款，虽同志中亦鲜有知者。^③

受孙中山鼓动为起义捐款的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开平人，先在檀香山经商，兼营农业，加入兴中会。1895年春，孙中山归国，数月后，荫南鬻其私产，得资万数千元，亦返香港，时来往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后荫南居九龙屯门，其寓所地僻人稀，附近山冈常有爆石工作，为支那暗杀团同志试验爆炸品之地点。^④孙中山记述，“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⑤但是，根据一项记载，广州起义前，檀香山兴中会曾给孙中山一千多元。^⑥没有资料可供证实孙眉兄弟为广州起义提供的金额，也不存在此役经营数年数省问题。在广州的孙中山不清楚在香港募款的具体情况。购械、运输及募勇费用，主要是由香港同志支付的。可以说，香港的商人同志是广州重阳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与郑士良亡走日本。孙本人被港英当局宣布禁止五年内在香港登岸。为制造革命舆论，1899年秋，孙派遣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12月下旬开始出版。经过1900年惠州之役，《中国日报》经费不支。幸是时富商李纪堂早经杨衢云介绍加入兴中会，于接济军饷外，尚能担负报馆度支。《中国日报》赖以不坠者，李之力为多。^⑦

李纪堂（原名李柏），原籍广东新会，香港富商李升之三子，为清季革命党员中捐助起义军饷最巨者。纪堂曾任日本邮船公司港分行华经理。父卒，

① 吴伦霓霞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香港1986年印刷，第38页。

② 《革命逸史》初集，第6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④ 《革命逸史》初集，第43页；第四集，第192页。

⑤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90页。

⑥ 《檀山华侨》，第16～17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7页。

⑦ 《革命逸史》初集，第67页。

兄弟八人析产，各得百万。纪堂挥金如土。1900年3月，由杨衢云主持加入兴中会。孙中山为经营惠州起义，6月间乘船过港，由衢云、少白等引纪堂登舟相见。孙立予两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纪堂于此役前后所耗不貲，加上支持《中国日报》常费，亦逾巨万。他还支持孙中山游历欧美，提供1902年陈少白赴河内参观博览会游资两千元。1902年洪全福起义，策划者为兴中会会员梁慕光、李植生等人，李纪堂为此役提供五十万元经费。经此役后，其家业因之耗费过半，渐呈竭蹶之象。1904年《中国日报》经费困难，亟图改组，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除两单位作合资本若干外，余由李纪堂出资五万元助成其事。纪堂还办了新界的青山农场，辟地数百亩，从事种植畜牧，且为内地起事失败后党人逃避之藪。另外，就是他出资两万元，办“采南歌”剧社，编演具民族主义的剧目，开日后“振天声”等剧团编演革命剧目的先声。1907年以后，他所开设的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因而宣告破产。虽然经济拮据，但对党人行险、募款、涉讼、外交诸事，他支持仍惟恐不力，如黄冈起义后余丑被清吏逮捕之讼案，1909年汪精卫等在屯门作爆炸品之试验，以及辛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投诚等，均得其助力匪鲜。^①

同盟会时期另一支持革命的香港富商是李煜堂（名文奎，以字行）。煜堂台山人。兄弟七人均经商美洲致富。煜堂返港后，创设金利源、永利源两药材行。后在港创设多间保险公司，人称之为“保险大王”。1900年，遣子自重赴日本留学。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自重与其妹夫冯自由受孙中山派遣返港，推广党务，在香港、广州、澳门各地设分支机构，煜堂与其弟文启亦入会。“丙午（一九〇六年）革命党惟一机关之中国日报为清吏及保皇党人倾陷，势濒歇业，先生徇陈少白、冯自由请，斥资承购该报，而使冯自由主其事。自丙午以迄辛亥，此革命枢纽之赖以维持不堕，实以先生之力为多。及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广州新军反正失败，国报（按：即《中国日报》）受当地政府严密监视，先生乃改以其数十年老店金利源药材行为交通机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以迄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所有海外党部汇输款项概由该店收解，间有同志假该店贮藏危险物品，店伙震骇，先生泰然处之。”^②

1909年10月，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据

^① 《革命逸史》初集，第92、93、94页；第三集，第161页。

^② 《革命逸史》初集，第194页。

胡自述,“支部费用,由港同志负担,林直勉、李海云则倾其家以为助”^①。据莫纪彭《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称,“南方支部设立的经费,系由林直勉析家产一万余元充用”^②。直勉家在香港开设林荣昌号,经营藤枝业。南方支部成立后,直勉任会计。至于李海云,是在准备广州起义紧要关头,提供经费者。时黄兴、赵声等相继抵港,倪映典亦盘马弯弓以待,而孙中山所募仅汇港港币八千元,距二万之数尚远。“支部诸人以为时迫,异常焦灼。有同志李海云者,文咸东街远同源汇兑业商号之司事也,目睹本党需款情形,认为机不可失,乃下大决心,尽提该商号存款二万余元献请南方支部,以充军费之需,己则隐匿他处,以避股东之追究。支部得此意外之生力军,遂派海云驻广州河南大塘乡李福林家,专任民军购械会计事务。”冯自由还记述,早先海云还贷款给《中国日报》解决经济困乏。远同源系海云父佑谱及陈元英父赴贤与同族某等之合股公司,至是海云乃诿为因金银业失败致亏空公款,转求父执李煜堂、同志陈元英等代向说项。诸股东察知海云此次毁家赴义之真相,亦咸为之谅解。在新军起义“事败后海云犹携其军用品款三千元至香港纳还机关部”。准备黄花岗起义设统筹部,分职任事,海云受任统筹部出纳课长。“三二九”之役前后海外各埠华侨义捐,概由金利源号商店收,而一切文据则由海云署名。^③林直勉、李海云二人,被称作毁家报党的事例受到褒扬。

根据冯自由记述,还有香港陈杨三家与革命党关系的问题。陈杨三家,系指香港富商陈席儒、陈赓虞及杨西岩三人。陈氏兄弟为香山人、檀香山华侨大种植家陈芳之子,各得其父资产巨万,归国后历任香港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买办,在港商界素以财雄见称。杨西岩,新会举人。少受乃祖遗下多量地产,有轮船码头曰杨泰兴,时人以大地主名之。1906年春,粤督岑春煊以武力收粤汉铁路为官有,陈杨三家以大股东资格领导粤省及港澳等地股东开会反抗,得到《中国日报》的支持,陈少白且充谋士。该报虽在香港出版,但销售则有赖于广州。岑督下令禁止港报入口,《中国日报》损失巨大。《中国日报》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后,成为文裕堂资产之一部分。1905年冬,因该报攻击保皇党在美洲行骗,被康同璧在香港法院控告文裕堂以毁谤罪,双

① 《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②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册,台北中正书局1964年版,第17~18页。

③ 《革命逸史》初集,第216~217页。

方涉讼多月未解。1906年夏,文裕堂营业状况不佳,有牵累《中国日报》之虞。陈杨等顾念《中国日报》在粤路风潮中之支持,曾对陈少白表示,若报馆为讼事不能支持,彼等当合力出资万元以助,借酬党人协助彼等之劳云云。到是年8月,文裕堂果然破产,陈杨等人虽然事前知之,但是默无一言,陈少白束手无策。冯自由时任《中国日报》记者,乃求援于其岳父李煜堂,得其帮助,渡过难关,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购出《中国日报》,始免于拍卖。香港同盟会诸人对陈杨等食言而肥,深致不满。随后孙中山发动黄冈、七女湖起义,欲向陈杨等筹军饷十万元,写信给冯自由交陈少白承办。少白愆于前事,未向彼等发言,将原函退冯自由了事。陈杨等原无意支持革命。黄冈起义,需款至亟,冯自由乃将孙函交陈赓虞,并委托李煜堂转询意见。赓虞对李声言,革命党起事妨害商务,殊属不智,如此次黄冈作乱,彼之(德忌利士)轮船公司营业即大受影响,即为明证云。陈杨等在粤路风潮停息后,为答谢陈少白,先后给陈九千元。少白并未将此款交公,而是用它购置了九龙牛池湾田产若干亩,辟为农场,移家居住,后来又将农场的一部分借给孙眉营生。^①

另据记载,有萧远岩者,潮州人,在香港经商。1905年,萧氏廿余岁,放弃家庭事业经营而投身革命,参加黄冈起义,为积极分子。黄燕南,出身香港富有家庭,曾任外国商行买办。1902年,辞去买办职位,积极参加在香港的革命活动,专志办革命报刊,撰写反清革命文章。^②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香港同盟会党务极形不振,新会员仅发展了百余人。同年冬,孙中山在槟榔屿开会,商议筹款再举办法,决定重在广州发难。1911年3月间,留东及沪鄂湘皖赣苏浙等地同志齐集香港,候时出发;南方支部派会员多人分赴各地购运械弹至港备用,并设统筹部为总枢纽,分设八课,各司其职。至3月下旬,已汇到香港十五万余元(后续收了万余元),于是有“三二九”黄花岗之役。此役,香港商人除李海云任统筹部出纳课长外,未见他人参与,亦未在港地筹款。但香港作为起义策划地、起义人员输转中心与收汇地点,已足于体现它在此役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乘着保路风潮高涨,香港成为革命党人暗杀广东清吏的谋划点。刺伤李准,孚琦、凤山先后毙命,一时风声鹤唳,清吏一夕数惊。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广东各县民军相率揭竿而起,日夕传言进攻省城。水师提督李准因与粤督张鸣岐不洽,见大势已去,

①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05~208页。

② 《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第63页。

在党人活动下，乃通款输诚于南方支部。各绅商在咨议局倡议独立。张鸣岐出走，各绅商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11月10日，汉民率港商李煜堂、林护、容星桥、余斌臣、邓仲泽、杨西岩、伍于簪、李茂之等十余人晋省就都督职。及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李海云遵命即将南方支部存款三十余万元尽汇上海，作为大总统就职日犒赏军士之需。《中国日报》随亦迁广州出版，至“二次革命”后为龙济光所封禁。香港党务报务密不可分。《中国日报》自1906年秋至1910年春，即冯自由主持期间，纯由同志商人措资接办。该报先后在港穗出版达12年之久，作为革命党喉舌，其重要性是显然的，它的生存发展，有同志商人的一份功劳，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胡汉民为都督的广东军政府，建政之初，即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清吏逃走时，搜劫了官厅银钱。张鸣岐扬言：“革命党即使占广东，也不能守三日也。”新军、旗营费用，刻不容缓。省城进驻十万民军，每日每人二毫伙食费，不能拖欠。政府新建，在在需款。胡汉民偕一批香港商人进省，用意极为明白。他任命李煜堂为财政部长，意亦同此。军政府委托省城筹饷局筹募公债500万元。又在香港设立筹饷局，以杨西岩、邓仲泽为局长。胡汉民还令李煜堂、杨西岩速向港商借款40万元，以救燃眉之急；同时，接受海内外捐款接济。不过这些措施仍不能解决问题，在粤省旧有纸币、银元一律照常流通的基础上，将库存官钱银局纸币1200万元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后发行，并令商会承认通用。危机虽然一时度过，但随之出现纸币贬值低折问题。

香港商人在广东光复后也有所贡献。据冯自由记述，光复后由李煜堂主广东财政，当时“民军所在哗噪，先生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餘万，饥卒乃就抚听命，库储亦以次就理”。又，“杨西岩于辛亥粤省反正一役，尝联合港商多人辇金附义”。^①但其具体情况不详。

杨西岩、邓仲泽的香港筹饷局，做出了一些成绩。据《广东财政司（首义九月十九日起至民国元年五月卅一日止）所有收入总数报告册》，香港捐款，旧历九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二日，29243元；元月份10700元；二月份1285元5毫。香港借款，旧历九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二日止，1367733元1毫1仙；元月份63015元6毫7仙；二月份2040元；五月份41049元3毫3仙。^②上述李煜堂所募之款，应在财政司册所记之数内。

在封建专政制度下，商人不顾身家性命，同情支持革命，时人视之为另类，只能是极少数，唯其不易，所以可贵。在商言商，商人欲与党人保持距

① 《革命逸史》初集，第194页；第二集，第209页。

② 《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第73页。李煜堂所筹之款，似未列入表内。

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以陈杨三家为代表的香港商人的基本而，大体如此。其中部分人在广东光复后回省城参政，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当时局势所需。但商人毕竟是商事从业人员，可以发财，却未必能做官。李煜堂以及以后的陈席儒等人之所以在官场玩不下去，除了政局不稳难以展其长才外，便是行当不同，舞台相异，即长袖亦难施舞也。

香港同志商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活动，其大略如此。